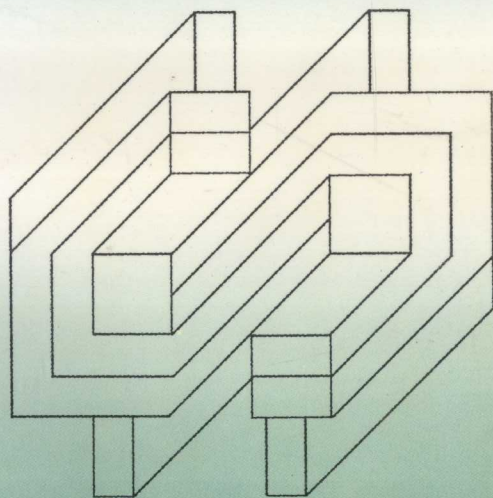


邓小平与跨世纪发展战略

主编 谭跃湘 王凤飞
李官生 贺星庚

下



湖南出版社

761-43/6 下

邓小平与跨世纪发展战略

——第四届全国邓小平与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理论研讨会文选

下

主编 谭跃湘 王凤飞 李官生 贺星庚

湖南出版社

1997年·长沙

责任编辑:黄楚芳

装帧设计:贺星庚

邓小平与跨世纪发展战略

主编:谭跃湘 王凤飞 李官生 贺星庚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东坪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6.375

字数:1205000

ISBN7-5438-1483-8

C·64 定价:58.00 元(全三册)

目 录

哲学基础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轨迹	李官生(1)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 哲学基础	许 明(23)
试论邓小平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魏虎德(28)
试论邓小平的哲学发展观	赵英荷(33)
哲学思维的一次伟大超越	赵兰郁 周建伟(39)
邓小平的战略性思维方式及其实践活动 ...	李凤友(44)
试论邓小平理论思维的时代特征	李志平(50)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论初探	谢永川(55)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党的 基本路线	沈建蒙 李宝强(59)
论毛泽东和邓小平“以斗争求统一”的 思想	张喜科(65)
浅谈邓小平的社会认识论特色 ...	皮映春 庞卫国(71)
新世纪的伟大使命,探索、揭示经济持续 发展的规律	刘琼英(77)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李 佩(85)
略论邓小平关于两个文明建设关系的 哲学观点	张 吉(90)

紧紧把握经济、政治和思想道德建设的

有机结合 彭纳揆(95)

邓小平经济政治思想的重点课题

刍议 许海峰 施光跃(100)

科学依据

试论邓小平关于

“三步走”战略步骤构想的科学依据 吴建生(106)

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科学依据 赵江波等(112)

浅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立及实施

这一战略的指导思想 卫 华等(118)

实事求是,创造现代化建设的合理

格局 王俊山等(123)

论跨世纪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定位 邹光宇等(128)

社会发展观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 王永杰(134)

发展的合理性问题及其探索 卞 谦(140)

浅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 阮黄南 蔡亚昌(146)

社会主义发展理论若干问题的

思考 姜小平 曹鹿琪(150)

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 郭欣根(156)

论确保中国健康发展的战略

基础	徐 华 艾集贤(162)
毛泽东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	李永玲(168)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尹 成(174)
深刻理解邓小平思想理论体系的特色	王万涛(178)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定性	
思维	于金秀(184)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	张景生(190)
社会主义本质的几点思考	何兴梅(195)
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	
之比较	刘志英 张朝晖(201)
试论邓小平创新思想	夏素清(207)
略论邓小平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的贡献	吴仁平 张友苏(213)

基本方针

试论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	周 勤 王三龙(219)
构建两手抓战略方针的	
大趋势	周忠安 谷凤斌(223)
略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历史	
必然性	安 正(228)
浅析邓小平“两手抓”理论的全面性	陆光代(233)
试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 ...	周文昭(238)
学习邓小平坚持“两手抓”的	
思想	范 红 闫兴家(244)

关于两手抓的几个问题	李淑秋 毛连胜(250)
实现跨世纪战略目标,必须坚持两个文明	
一起抓	杨家宝(255)
坚持两手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	文红梅(261)
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及其与传统文化的	
关系	许火盈(267)

党的建设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继承与	
发展	张希仁(272)
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承与	
发展	朱立范(278)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张 强(283)
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贡献	刘玉恒(288)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	杜义朝(293)
正确认识与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	
的关系	周兴武(299)
正确认识制度建设,开创党建工作	
新局面	李 霄(304)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	师永珍(310)
改进和加强新时期党员教育工作	梁惠霞(315)
试论干部队伍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需要	刘宝珍(319)
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是实现	
跨世纪战略的关键	李祥焕 傅琳(325)
培养接班人,跨入新世纪	郭慧贤 张文庆(331)
努力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	贺耀贵(337)
用科学理论武装跨世纪干部势在必行	田晨(343)
培养跨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家要突出	
三个方面的教育	符咏梅(348)

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纲领	郑宪(354)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与跨世纪发展	
战略	雷雯(358)
邓小平在反腐倡廉问题上的理论	
贡献	黄玉兰 于旭阳(364)
反腐败:一个跨世纪的课题	肖北婴(369)
论腐败与价值误区	张永华(375)
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的若干思考	孟海天(380)
试论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形成及其	
主要内容	周盛盈(386)
邓小平治国方略的人民性	李德阳 杨遂生(392)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民主	孙洁(398)
论邓小平民主建设思想	杨淑芳 张道华(404)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走中国民主与法制	
发展之路	杨斐(408)

邓小平法制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

- 建设 陈保中(413)
- 依法治国, 厉行法治 张小丽(418)
-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完备的
- 法制 孙 杰(423)
-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之最 费 凡(429)
- 论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的历史作用与理论
- 贡献 王新林(434)
- 香港百年, 历尽沧桑 徐国栋(439)
- “一国两制”与马克思主义的“调停人”
- 学说 黄荣坤(445)
- 浅谈邓小平的精兵、利器、合成
- 思想 宋其文 郑修良(451)
- 浅析邓小平新时期关于军队建设的
- 思想 高顺成(456)
- 简论邓小平的民族观 王 慧(461)
- 民族是历史范畴的观点对民族工作
- 的指导意义 刘 章 侯晓星(467)
- 试论做好保密工作在实现跨世纪宏伟
- 目标中的战略意义 王瑞璞(472)
- (388) 盛盛周 容内麦主
- (393) 王 强 封另人前制衣国部平小取
- (398) 都 伟 主另义主会封另平小取
- (404) 平 强 封另另重主另平小取
- (804) 裴 琳 封另已主另国中封, 号封另封另平小取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轨迹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产生、发展和逐步走向成熟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作为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与之相伴随的,而且往往是它的先导。本文拟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轨迹作一初步探讨。

一、理论的历史起点:实践标准论

1978年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那场讨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起点,实践标准论的重新确立成了这个理论产生的标志。

这场反映人民群众愿望和历史转折要求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标准的确立,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的前提和先导。没有实践标准的确立,没有思想路线的转变,就没有政治路线的转变,就没有组织路线的转变,就没有历史是非的清理,就没有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①,“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②。这场讨论从哲学上重新武装了全党,在实践中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早就解决了的问题。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地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③列宁指出:“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④实践之所以具有检验认识正确性的功能,在于“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具有普遍性的优点,而且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⑤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强调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⑥他还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他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由就在这个地方。”^⑦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了实践标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才从思想上打破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发展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建国初期,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从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了这个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真理标准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被“四人帮”搅得一团混乱,实践唯物主义原则遭到严重践踏。一时,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

1976年10月,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照理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当立即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1976年10月26日,他在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强调:要集中批“四人帮”,连

带批邓；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免不说。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他说，要继承毛主席遗志，就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同年12月25日，他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重申：只准批右，不准批左，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977年1月21日，在一个讲话稿中，他进一步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接着还指示其写作班子，改成“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写成2月7日《人民日报》《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发表，从而形成了“两个凡是”的基本观点。他在同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根据这个观点，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要求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同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发行，他还说贯穿这本书的根本思想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此清楚地表明“两个凡是”的观点，不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早在1977年2月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是不对的。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年5月，邓小平在同当时中央的两位同志的谈话中，严正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⑧。同年7月，邓小

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从正面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⑨他强调:“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⑩在当时个人迷信盛行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真正区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本人晚年错误。因此,最重要的是启发人们承认并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邓小平这些讲话,使人们从狂热的个人崇拜,从以教条为准则的僵化思想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判断正确与谬误的标准问题。

1977年冬,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党校日常工作的胡耀邦,在回答学员的问题时,就明确表示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一篇来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经胡耀邦最后审定,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文章发表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从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两个凡是”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对这篇文章大加斥责,批评该家新闻单位是“砍旗”、是“丢刀子”,并指示主要新闻媒介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卷入”。而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则对文章的观点表示了热烈地支持。邓小平以极大的热情支持了这篇文章的观点,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6月22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①如果我们不坚持实事求是,不坚持实践标准,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②。在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下,不少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其中,6月24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的发表,正面回答了反对者的责难。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的首要成果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作了多方面的深入阐述,揭示了它的丰富内涵,使它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把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了启发人们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邓小平刚一复出,就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7年9月,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中就指出: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978年6月2日,他进一步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③接着,9月16日,他在视察吉林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后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④在这里,实事求是不仅作为一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且被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

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精髓。

第二，进一步揭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涵。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实事求是解释为理论联系实际，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等错误思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新的揭示，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十二大把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概括完整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包括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等一系列基本原则。同时，它第一次明确地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引进党的思想路线，这是对真理标准讨论成果的概括，也是对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总之，经过这样的概括使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和现实指导作用。

第三，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加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认为，要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解放思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⑥坚持实事求是之所以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说，是因为不少同志的思想“处在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这种状况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

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因此，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实事求是，而思想解放的目的又在于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⑩总之，邓小平强调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

第四，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⑪“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⑫。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是贯彻执行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关键。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⑬没有实事求是，毛泽东不可能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今天也不可能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场讨论的成果不仅限于哲学问题，实践标准的确立。它的敏感性、尖锐性恰恰在于它的政治意义。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影响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几乎长达2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表明党的政治路线开始步入正确轨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新事业开始启动。首先是农村改革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接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开，旧的体制开始被突

破。同时平反历史冤假错案全面展开,党的正确组织路线开始得到恢复。由于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党开始了对国情的重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由于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使党有可能正确评价影响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总之,这场讨论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从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从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束缚下,即把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神圣化、教条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道路。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前提和历史起点。

二、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力标准论

党的十三大着力论述了生产力标准,在这以后,在学习和贯彻十三大精神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新起点。生产力标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哲学基础。因此,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不仅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的标志,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发展、形成主题、全面展开,形成轮廓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但是他们在论述唯物史观时就强调指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列宁是第一个直接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的经典作家。他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曾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